
抗战时期浙江中共新闻活动的再研究

何扬鸣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新闻活动。中共在浙江的全方面、多层次的新闻活动是其他地区所不多见的，为浙江和全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在浙江新闻活动的开展和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中共浙江各级组织对新闻活动在抗战事业中作用的重视。对抗战时期浙江中共新闻活动的认真梳理和再研究，将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共宣传史的内容。

【关键词】抗战时期； 中共； 浙江； 新闻活动

【中图分类号】G219. 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6552 (2011) 05 — 0029 — 08

随着日军疯狂南进，尤其是杭州的沦陷，曾经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新闻事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随着战局的稳定，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下，浙江国统区内的新闻事业逐渐地恢复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共的新闻活动也随即活跃起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后，中共又公开出版和发行了各种报刊。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全方面、多层次、持续不断和成果丰富的新闻活动，不仅在抗战时期是极其突出的（浙江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至少是不多见的），而且也应该是中共党史、中共宣传史上辉煌夺目的一笔。可惜，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分析和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将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共宣传史的内容。

一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浙江，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吸收到浙江国统区的各个部门工作。在支持和帮助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各级政府创办抗日报刊的工作中，宣传抗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是工作的重点。纵观整个抗战时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遍布了国统区各个地区，而且每个地区中共主办或参与的报刊数量多，品种也多。这种现象在其他国统区是罕见的。限于篇幅，不能面面俱到，所选的地区也只能择其重要。

富庶的杭嘉湖地区沦陷后，温州等地区由于靠海而成浙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了。另外，十年内战期间，浙南是中共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浙南红军赴抗日前线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浙南的平阳、温州等地设有不少新四军后方办事机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浙江省委建立后，就驻扎在浙南地区。同时，中共的新闻活动也始于浙南。

1937年8月14日，油印《战报》在平阳创刊，后改为《平阳日报》，再改为《平报》。《平报》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批准创办，报头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题写。但是《平报》编辑部人员全是中共党员或倾向中共的知识青年，受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特委的青年部长胡景斌还曾主持过编辑部的工作。《平报》不仅时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而且其副刊为“持久作战持久呐喊”而取名为“持久”。报纸还经常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另外，浙南还有一家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出版发行的《生线》，创刊的时间也比较早，于1938年1月1日在温州创刊，曾刊登了《论温州学生救亡运动》、《延安动态杂写》等文章。

1937年年底，浙江省会迁到金华。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沦陷。在这约4年半的时间里，金华不仅成为

作者简介：何扬鸣，男，副教授。（浙江大学 新闻系，浙江 杭州，310028）

浙江省乃至中国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文化中心。在这座“东南抗战文化名城”或者“东南抗日文化前哨”里，新闻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浙江乃至中国东南地区的新闻事业中心。

《浙江潮》创刊于 1938 年 2 月 24 日，是浙江省政府的机关刊物，并由当时的“浙江省抗日自卫总司令部”（黄绍竑兼任总司令）出资。然而，《浙江潮》实质上是中共在浙江宣传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受中共浙江省委和金（华）衢（州）特委的指派，一大批中共党员先后担任了《浙江潮》的编辑。除了主编严北溟（浙江省抗日自卫总司令部秘书、浙江省军官教导总队政治指导处主任），其他编辑都是中共党员。《浙江潮》的编辑方针及内容，都是严北溟与中共党员们共同商定的。《浙江潮》最初的 6 期中，中共党员们所写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而且还动员熟悉的文化人踊跃为之撰稿。1940 年上半年后形势恶化，一批中共党员不得不先后撤离该刊，支部也不复存在，但是中共始终没有放弃对该刊的领导，中共党员始终在刊物内部坚持工作。1941 年 3 月，《浙江潮》改编为《浙江日报》，整个编辑部仍以中共党员为骨干和核心，通过改写，来自延安的消息还是经常在报纸上出现，副刊上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仍深受读者的欢迎。

为挽救和保育受难儿童，推动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宋美龄和邓颖超等 100 多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 年 6 月 5 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其正副理事长、15 位理事和常务理事中，有省政府主席和其他国民党党政要员的夫人、女儿，也有中共的女干部，还有一些倾向进步的知识妇女。《浙江妇女》是浙江保育会的机关刊物，黄绍竑、蒋经国等军政要员为创刊号题过词。然而，该刊又是中共一个重要的新闻宣传阵地，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①的负责人邵荃麟、葛琴都亲自抓过，其历任主编都是中共党员。

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妇女之路》曾专门介绍评论了国统区 13 种比较优秀的妇女刊物，文章认为《浙江妇女》“是妇女月刊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一种月刊，每期的‘岗哨’及述评均能及时提出若干妇女问题。最充实的是‘各地通讯’，各地妇女动态及各阶层妇女生活都能真实地反映出来，间或刊载一些妇女工作经验教训”。^[1]文章对《浙江妇女》评价远高于其他妇女刊物。《浙江妇女》发行量从 1000 上升到 3000 多份，读者也遍及浙江省内所有未沦陷的 52 个县及江西、福建、广西等 11 个省。^[2]

除了妇女以外，中共对青年和少年儿童的教育同样十分重视。1938 年 8 月 20 日，由中共东南分局青年局主办的、一份专以青年为对象的刊物，在江西南昌出版，这就是《青年团结》。该刊在南昌出了 6 期后停刊，继而在 1939 年 2 月 16 日在浙江金华复刊，续为第 7 期，中共金华县委宣传部长杜麦青任主编。浙江省中共组织十分重视这一刊物。1939 年 6 月 13 日，中共浙江省委青年部给各级青年部、青委会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青年团结》是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刊物，它担负着研究和指导东南青运以及反映各地青运的实际任务，并将成为团结全体青年参加抗战的武器。因此，我们号召各级青年部，热烈地、积极地从各方面来帮助和爱护这一刊物。”信中不仅要求各地青年组织要“发动广大青年群众，阅读《青年团结》，组织青年团读者会，研究和讨论重要论文和接受各地工作的实际经验教训。”^[3]

抗战时期，天目山地区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浙江抗战的前线，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而且与皖南新四军相距不远。因此，中共对天目山区的工作十分重视，从 1938 年春夏之际开始，中共浙江省委即陆续派遣党员、干部（或自找关系）到浙西行署各机关、团体工作。

1938 年底，黄绍竑在王闻识（时任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团第三支队政训室主任）面前透露出打算在天目山区办一份报纸。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骆耕漠和邵荃麟、葛琴指示王闻识，要他利用同乡关系力促黄绍竑办报宣传抗日。报纸筹备过程中，省文委全力支持。次年 1 月 5 日，《民族日报》创刊。

民族日报社先后有工作人员 60 余人，中共党员占一半。1939 年 7 月，中共民族日报社特别支部（书记王闻识）建立，直属中共浙西特委领导。报社各部、室的负责人，多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报社还另有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成员是中共发展党员的重点对象。民族日报社一度还是中共浙西特委的秘密驻地。1939 年 8 月，浙西特委迁至莫干山后，

报社由中共於潜中心县委书记贺千秋具体领导，他本人也以报社外勤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民族日报》不仅努力宣传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宣传了团结抗日路线，而且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宣传策略上努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成为浙西抗日民族文化的一面旗帜，影响遍及浙西广大地区，发行量也从 3000 多份逐渐增加到 8000 多份。^[4]

浙东地区是抗战的前线，日军时时有可能向浙东地区进攻，并通过浙东地区进一步占领更多的国统区。同时，富庶的杭嘉湖地区沦陷后，沿海的港口城市宁波等也成了浙东地区的经济中心。1937 年 10 月，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成立，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爱国力量，运用报刊舆论，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在宁波和绍兴一带的国统区，中共主办或参办的报刊数不胜数。

奉化《战时大众》是份通俗小报，1938 年 5 月创刊，胡华等发起，中共奉化县工委主办，胡华任主编。由于价格低廉（每份 3 个铜板），报上的抗战道理通俗易懂，所以深受群众欢迎，发售量超过当时政府主办的《奉化日报》，常有脱销的情况。胡华把每期《战时大众》按时邮寄给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曾亲笔回信：“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5]

绍兴地处钱塘江南岸，是浙东抗日前哨。1938 年 5 月，浙江省政府绍兴专员公署创办《战旗》杂志。1939 年 3 月，周恩来来绍兴地区视察，至《战旗》与主编曹天风恳谈抗日救国大事，参观杂志社，并于第二天书赠曹天风诗一首——录自沈复生诗作，后刊于《战旗》：“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饶渡吹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6]

1939 年 11 月，中共宁绍特委调中共党员张璞君（即骆宾基，兼三区政工队政治教官）任《战旗》主编，中共党员陈静之（即陈午韵，兼三区政工队指导员）任副主编。从 1940 年 3 月 81 期《革新号》起，《战旗》实际为中共绍属特委掌握，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公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为宣传要点，报道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和形势，动员人民加强组织训练和武装工作以保卫绍兴。《战旗》的稿源广泛，除经常刊登著名人士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的评论外，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中共党员之手。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也为《战旗》提供了大量资料。《战旗》销往全省及长沙、汉口、成都、西安、贵阳等地。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始于国统区，而且抗战前期也主要集中在国统区。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形成的一个文化发展现象，但是其规模和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却十分突出，是其他国统区难以比拟的。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当时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局面有密切的关系。国共关系和谐一些，中共的新闻活动就热火朝天，浙江的新闻事业就发展，反之，中共的新闻活动就处于低潮，甚至停顿，浙江的新闻事业就严重受损。

二

1921 年中共成立时，浙江就有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并有其报刊。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共的报刊当时还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出版发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粟裕等领导的红军先后在浙西南等地活动，因没有稳固的根据地，虽然也办了报刊，但没有条件在社会上公开出版发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因浙江是蒋介石老家，从维护统一战线考虑，上述国统区的中共报刊，也多以“灰色”的面目出现。

1941 年 4 月，日军在浙东发动了宁（波）绍（兴）战役，连陷杭甬铁路以北、杭州湾以南的整个地区。为此，中共中央号召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7] 1941 年夏，中共领导的浦东武装南渡杭州湾到达三北地区。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浙江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全国的 19 块根据地之一。自此，中共在浙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中去

了，其新闻活动也主要集中在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根据地。

1942年6月，浙东根据地建立能接收延安新华社电讯的新闻电台，接收到的新闻电讯编成《电讯稿》，分送部队首长阅读以了解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形势。《电讯稿》仅是油印8开4版的小报，数量大约几十份，发行范围小且是特定的，还不能算是报纸。但是，新闻电台的建立和《电讯稿》的编印，打破了敌伪的新闻封锁，也标志着浙东以及浙江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诞生。

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区党委一成立，就十分重视新闻工作，《电讯稿》改名为《时事简讯》，8月初，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组建报社机构。这是浙东，也是浙江省最早公开出版的中共的机关报。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中共在浙江有必要也有条件公开出版发行机关报了。这在浙江中共党史和浙江新闻史上都有其意义。

《时事简讯》初为油印8开4版，周三周六出版。1943年7月7日，《时事简讯》从第129期起改为铅印，扩为4开4版，前三版是转载延安电讯稿，内容以国际新闻为主，第四版是浙东地区的内容。《时事简讯》视情况也增加到6至8个版，主要刊登浙东地方新闻。《时事简讯》虽然以转载新华社电讯稿为主，地方色彩不够鲜明，但是“在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上，在团结争取与教育浙东敌后各阶层人民上，在反映浙东党的工作与群众的要求上，在帮助中共党员和根据地战士的政治教育与思想领导上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8] (167)}

1943年春，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中共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决定筹备出版铅印的综合性报纸。同年6月，浙东根据地的第一家印刷厂建立，不定期地试刊铅印的《浙东报》，这是浙东根据地第一份综合性报纸。1944年初，三北游击司令部改变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正式打起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旗帜。1944年4月13日，中共浙东区党委“将现有之‘时事简讯’改为‘新浙东报’，并明确决定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

《新浙东报》是中共在浙东根据地的喉舌。《新浙东报》第一版，主要发表中共中央和浙东区党委的重要文件、指示，转载新华社重要电讯，报道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新闻，并经常发表党政军领导的重要文章；第二版为国内新闻版，其中又以介绍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特别以延安解放区的情况为主；第三版为国际新闻版，主要刊登以苏德战场为主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第四版，开始为科学文化版，后相继开辟“新地”、“文艺周刊”，刊登小说、特写、诗歌、杂文等文艺作品；在不定期的“生产专刊”上刊登其他解放区生产经验文章。此外，还辟有“浙东妇女”、“浙东青年”和“新文教”等专刊。

由此可见，与延安和敌后其他中共机关报一样，《新浙东报》在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中共的指示，反映和指导各地的工作。浙东区党委决定《新浙东报》上的社论、区党委及各部门领导的文章，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浙东党委的各种文件一样，均为中共的正式指示，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必须经常组织学习和讨论，各地党政军民各部门的负责人要注意把本部门的工作及时反映到《新浙东报》上来，利用报纸来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实际问题，教育同志，推动与领导工作。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华社华中分社决定在浙东根据地成立新华社浙东支社，委派原新华社华中分社副社长、《新华报》编辑部副主任兼采访部主任于岩从苏南根据地来担任社长。同年5月，新华社浙东支社改为新华社浙东分社，归延安新华社直接领导。分社配有无线电台，能及时接收新华社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的新闻电讯等，并将采访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新闻，并向延安新华社总社发稿，如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2日以较大的篇幅报道了浙东分社播发的题为《浙东余姚等县民众反抢粮斗争如火如荼，军民配合夺回粮食十万斤》的消息，1944年9月初，延安新华电台广播了浙东游击纵队《气壮山河的大鱼山岛战斗》通讯等。新华社浙东分社还将采访到的地方新闻和接收的新闻电讯供给给《时事简讯》等报刊。

在《新浙东报》和新华分社的带动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报刊迅速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的4个行政区、14个县的中共党委、政府及部队也都分别创办了报刊，四明地区、中共四明地委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学习与工作》，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和敌工部领导还有日文版的反战刊物《解放周报》；金（华）萧（山）地区，中共金萧党委出版了《时事简讯》；诸（暨）义（乌）东（阳）地区，中共诸义东党委创办《团结抗日报》；金（华）义（乌）浦（江）地区，中共金义浦党委办起了《抗日报》，等等。这些报刊，既宣传了中共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向抗日军民提供了精神食粮，及时地向浙东根据地人民传播了敌后各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又讴歌了浙东根据地广大军民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英勇气概，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说：“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9]浙东根据地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浙东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搞得也是如火如荼。

抗战后期，浙东根据地还向外发展新闻事业。1945年6月，为了在中共控制的上海浦东、浦西地区发展新闻、出版事业，浙东根据地抽调了十几名干部和业务骨干去该地出版了日刊《新闻社简讯》，将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的形势传给浦东、浦西的广大军民。该报虽是油印的，但发行量也有五六百份。

浙东根据地不仅创办了各级党报，也建立了报刊通讯发行网。当时各地委、县委的秘书、宣传部长，部队各支队的宣教股长、大队教导员；行政委员会（行署）的各县办事处秘书、文教科长、学校督学以及一大批战士、工农群众都成为浙东根据地中共党报的出色通讯员。在发行方面，地县区以及乡镇都有党报发行员、推销员。各保（根据地共有3780个保）、学校、较大的商店都订阅了根据地的中共党报。

抗战期间，除了浙东根据地外，离杭州不远的地方还有浙西根据地。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到江南敌后，在苏皖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部去江北，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将中共浙西地区党组织划归中共苏皖区党委领导，浙江长兴、安吉部分地区便为中共苏皖区党委领导，建立了敌后根据地。1944年10月10日，《苏南报》在长兴县问世，该报是以新四军16旅政治部《火线报》为基础创办的，是中共苏皖区党委机关报，4开4版，三日刊，铅印，由时任中共苏皖区党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欧阳惠林任社长兼总编辑。1945年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中共苏南和浙西两区党委合并，成立中共苏浙区党委，同年9月1日，《苏南报》更名为《苏浙日报》，成为中共苏浙区党委的机关报，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社长。同年10月，《苏浙日报》随新四军北撤，先是苏北后转山东，最后全部人员和物资器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大众日报》所接收。此外，中共苏皖区党委创办了理论刊物《整风》半月刊，苏浙军区司令部出版了《苏浙前线报》、《前线》等内部刊物。中共安吉地下组织也创办过报纸《进攻》等。浙西根据地还成立新华社苏浙分社和苏浙出版社。

综上所述，抗战后期，随着浙江中共根据地建立，中共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达到了毛泽东“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10]的要求。浙江中共根据地并不大，创建的时间也比较晚，但是其新闻事业却搞得很出色，不比其他中共根据地逊色。它的进步和发展，弥补了国共关系恶化后中共在浙江国统区中新闻活动的低潮，在另一条战线上丰富了中共新闻事业内容，重整和壮大了中共新闻事业。

三

抗战时期，浙江国统区内抗日救亡活动是轰轰烈烈的，浙江抗战前线的战斗是可歌可泣的。浙江的抗战是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过良好的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就在浙江着陆、盟军也曾打算在浙江登陆等等。这一切与浙江抗战新闻事业的活跃很有关系，也有中共新闻活动的贡献。

中共在浙江新闻活动的成就之所以如此地突出和巨大，从客观上讲，是因为抗战全面开展和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因为浙江地方当局中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开明，尤其是省政府主府黄绍竑对中共的友好态度。在黄绍竑办报建刊的过程中，中共派了大批

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帮助工作，其中有许多是中共党员，他们在报刊的筹备、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宣传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中共的党员组织对新闻活动在全面抗战中意义和作用的高度重视。本文下面将主要论述这一点。

十年内战时期，除活动于浙南、浙东南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外，浙江其他地方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殆尽。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各级组织在浙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7年12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恢复中共浙西南特委，次年5月，改为中共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以抗日救亡工作团名义在丽水所属各县开展活动。当时，汇集丽水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利用合法地位，带领来自全省和外省的一批进步青年，与当地文化人士和知识青年相结合，抓住一切时机，组织文化团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丽水各项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使丽水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基地。

1938年5月7日，中共浙江省临时省委成立，决定：“浙江文化运动现已进入统一组织的阶段，所以，（1）要促成浙江省文化界统一组织的成立，并成为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2）推动和建立各种研究性的文化组织，以加强抗敌及文化的普及与深入研究的运动。（3）广泛的发展与建立歌咏的团体及全省剧团的联合组织，发动参加已有的各种职业性文化团体，以推动文化救亡工作，加强统一战线。（4）加强出版界与各报纸杂志的联系，及时有计划地进行抗战宣传与教育工作。”^[11]临时省委还要求利用所有的宣传方式——文字的、口头的、戏剧、歌咏、座谈会、纪念会、各种刊物报纸、各种救亡团体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11月，省委决定成立直属的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对抗战文化工作的领导。省文委由骆耕漠（书记）、邵荃麟、葛琴3人组成。省文委工作就是发动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组织、指导各种文化团体与各种报刊的活动。省文委的建立，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共对文化统战工作和各文化社团、报纸杂志、出版机构、戏剧歌咏、文艺创作等的领导。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省文委针对不同情况实施领导，凡是有条件的社团、报刊、出版等机构，都建立了中共的秘密组织，如省文委成立后，就在《浙江潮》编辑部内相应建立了文化支部；无条件建立中共党组织的，也由中共地下党员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省文委是对内的，骆耕漠、邵荃麟、葛琴的公开身份就是办刊物。因此，省文委直接创办了机关刊物《东南战线》，并推动了《刀与笔》、《浙江妇女》、《东南儿童》、《民族日报》等刊物的创办。此外，中共金衢特委、处属特委和台州特委等也分别建立了特委文化党团，具体领导当地的文化工作。1940年春，中共中央东南局为了加强对东南各省抗战文化的领导，决定在金华成立直属的、以邵荃麟为书记的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东南文委”），领导浙赣皖闽4省的革命文化工作。

省文委和东南文委的成立，对东南诸省的包括新闻活动在内的文化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样，中共在浙江编辑、出版的大量各种报刊，也加强了省文委和东南文委的领导。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潮》、《东南战线》，这两个刊物实际上成了省文委和东南文委领导浙江乃至东南地区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要宣传阵地。

在中共对浙江新闻活动的领导中，必须要提的是1939年春天周恩来的浙江之行。在浙期间，周恩来分别约见文化界的骆耕漠、邵荃麟、葛琴、严北溟、刘良模、吴大琨、杜麦青、曹天凤等人，对报刊和抗战宣传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他说，《东南战线》、《青年团结》、《浙江潮》等刊物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搞得太空“红”，不要对国民党进行不必要的刺激。^[12]在浙江省立浙西临时中学的开学典礼上，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浙江为东南文物之邦，今天浙西中学的开学典礼，就给了我们一个事实上的证明，在最前线在天目山竟能集中整千青年受教育训练，这真不但东南各省少有，就是在全国各省都是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再就书报刊物来说，也能够分布很平均，并不像以前的文化读物只集中在城市，形成偏倚的毛病”。^[13]针对敌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一步进攻，周恩来要求：在“沦陷区我们还有许多老百姓得不到祖国消息，受不到祖国的教育，却只看到敌人和汉奸们荒谬的文字，只听到敌人广播的反动宣传，这种情形长久下去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赶快想

法子补救，应当尽可能地用文化进攻的方法把这些民众的头脑抢救过来，肃清和纠正他们所受敌伪的反动宣传。有时我们在沦陷区内因为环境关系，不能公开的作普遍宣传，那我们就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运用各种宣传的技巧去进行，比方弹词、说书，或其他的方法都可以。”^[13]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在浙江的新闻活动作了调整和改进。省文委曾认为，《民族日报》是黄绍竑出面办的报纸，根据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日报》“不宜办得太红”，不要超过《浙江潮》和《东南战线》，“坚持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并面向游击区”。^[14]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提出的办报方针，《民族日报》编辑部确定了总的办报原则：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在报道思想上也制定相应的报道原则。

曾山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对浙江的新闻活动也很关心。1938年3月2日，曾山到达金华，做恢复发展金华和浙江中共组织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3月4日，曾山一行视察了浙江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金华城内斗鸡巷四号。斗鸡巷是金华乃至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金华和浙江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举措都从这里决策。斗鸡巷四号周围，还驻有十几个抗日救亡团体，汇集了100多位全国著名的学者和文化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在斗鸡巷四号，曾山一行会见了浙江省工委全体成员和从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同志；访问了由中共党员、著名学者杜国庠率领，由林默涵、何家槐、麦新、柳青和孙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团。曾山第三次来金华，是与东南局委员、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于3月10日一起来的，是为了迎接周恩来的。曾山、黄道视察访问了在金华城内的抗日救亡刊物的编辑人员和抗日书店，如酒坊巷34号的《浙江潮》编辑部、柴场巷15号的省文委驻地和《东南战线》编辑部、文昌巷15号的《青年团结》编辑部。曾山视察了酒坊巷、柴场巷、文昌巷之后，风趣地说：“去年3月，我视察了斗鸡巷，这四条巷是金华辉煌灿烂历史的象征，这四条巷是我们党建立的四处文化堡垒，它们在抗日斗争中不亚于四个正规军，它们用笔当枪炮，猛轰猛击日本侵略军。这四条巷又是我党活动的据点。”曾山强调再强调，要浙江省委、金衢特委加强这四条巷的领导。^[15]

至于中共根据地中新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除了中共全面领导的因素外，还有新的因素。抗战时期，中共新闻事业不仅有巨大的发展，而且还逐渐成熟起来了，也就是说中共新闻事业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方针和政策。由于这一切主要发生在延安，因此被称作延安新闻事业。在延安新闻事业的指引和影响下，中共敌后各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相对而言，浙江中共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也比其他敌后根据地更远离延安，但是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与延安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在《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中共系统地总结了中共党报工作经验，形成了党报工作原则、方针、作风、方法与核心内容的党报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为此，浙东区党委专门也成立了由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党委军事部长兼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及党报负责人张瑞昌、江岚的“党报委员会”，谭启龙任主任。“党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经常注意检查与确定每一时期报纸之政治方针”，并带头撰写社论、重要新闻等。区党委还发出文件，要求根据地“各级党委与全体党员应在中央‘全党办报’的号召下把关心爱护，把研究出版推销党报，为党报写文章写新闻通讯作为自己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16]⁽¹⁶⁸⁾这表明，浙江中共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时时事事深受延安新闻事业的指导和影响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早期的国统区还是在后期的中共根据地，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其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将其视为通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将其视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的必要手段。正因为如此，在只剩半壁江山的国统区里和面积并不太大的中共根据地里，中共全面地、持久地、多层次地将其新闻宣传搞得有声有色，独树一帜，为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为中共新闻事业日后的更大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中共党史、中共宣传史上添上了值得赞耀的一笔。

参考文献：

-
- [1] 一年来的各地妇女刊物介绍 [N]. 新华日报, 1942-12-29(4).
- [2] 林琼, 秦秋谷. 《浙江妇女》出版始末 [A]. 金华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C].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1: 258.
- [3] 中共浙江省委青年部给各级青年部青委会的指示信 [A]. 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上) [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4] 王国林. 天目抗日(下)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417.
- [5] 何守先. 宁波新闻纵横 [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7: 34.
- [6] 邵梦龙. 绍兴新闻事业九十年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4: 36.
- [7] 浙东抗日根据地 [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25.
- [8] 浙东区党委关于出版《新浙东报》与加强报纸工作的决定 [A]. 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上) [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167.
- [9]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 [Z].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90.
- [10] 毛泽东. 论政策(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69.
- [11]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六七两月工作的决定 [A]. 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上) [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31.
- [12] 骆耕漠, 葛琴. 周副主席在浙江抗日前哨 [A]. 金华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C].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1: 123-124、154-155.
- [13] 临安县党史办公室. 一九三九年三月周恩来在浙西临时中学 [J]. 浙江党史通讯, 1987(7): 18.
- [14] 朱万年等. 抗日前哨的一面旗帜 [A]. 临安革命史料选编 [C]. 临安县印刷厂印刷, 1987: 71.
- [15] 许金翔. 抗战初曾山同志在金华 [EB/OL]. <http://www.jhnews.com.cn/gb/content>.